

王旭先生办教育

史梦兰

王旭先生字晓村，西斋堂村人。他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以后，到民国以来斋堂川仍留存的一位秀才（据我所知：另还有一名举人，叫刘增广，字心斋，灵水村人；东斋堂村也有一名秀才叫贾文儒的）。毫不奇怪，秀才都是严遵孔训的。王旭先生学识渊博（学而不厌）、品行端正（正心修身）、性情耿直（温而不缁）、为人忠厚（中庸之德），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诲人不倦），虽说化不及三千，也可算桃李满山坡了，他的学生遍及原宛平七、八、九三个区。

斋堂川地处百花山下，是个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然而论民智却不能说不开化，其原因除地理条件上靠近大城市北京易于接受文明影响外，人民重视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村村有学校，而这就要归功于王旭先生在他有生之年所做的贡献了。

王旭先生是我高小时的老师。当时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在山区都是春季始业，校历一般是阴历正月廿日开学，整个阴历六月放暑假，七月初一开始第二学期，腊月廿日放寒假。有趣的是他对正月开学一直叫做拜圣人，由他焚香并赞礼，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圣人牌位行跪拜礼（后改鞠躬）并唱《孔子歌》，歌词还记得几句，开头一句是：泗水之精尼丘灵……中间有句文教被八荒……最后是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后孰为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有一次他宣布礼成后，人们就要散去了，他把人叫住说：“你们是来跟圣人读书吗？”大家一时怔住了，莫知所措。有个聪明人醒悟过来，喊了一声：“给老师叩拜！”大家才一齐跪下给老师叩头，这就是拜了圣人还得拜师。

我上高小是在1923年正月，当时不满十二周岁，而王老师已是古稀之年。戴一副近视眼镜，装着满口假牙，读开口音时，假牙脱落，司空见惯，不以为笑，也不敢笑。我们课堂作业时，他坐在讲台上闭目养神，明显地已是力不从心了；所以在我上高二时，他就停办了原有的师范传习所，三年毕业时，高小班也停办了。此后，以其德高望重和年事很高的条件，创办了一所女学，我姑史文淑就是第一批学生。至此，我家三代人中有四个人曾是他的学生。（我三祖父史广奉跟他念私塾，未考取秀才而发了疯；我四叔史云章上过他的师范班，曾做小学教员）。

王旭先生办教育，是私立的性质。私塾都设在老师家里，王旭的家有一座楼房，外地求学来的就住在他的楼上。（西斋堂有三处有名的古建筑：两座楼房一座七檩房，主人都姓王，可能有什么来历，遗憾地是我不知道。）教私塾可能是他办教育事业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传说他考中秀才的名次，虽不是第一名，也不出前五名；就是说他已有举人的学问，遗憾地是在考举人时因意外的脏卷犯规而被黜。从此就以教书为业了。这里添一段插曲：当时人们都对他未中举而惋惜，不免去从迷信说教中找原因，据说考场阴森可怕，叫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原来王旭先生第一个夫人是上吊死的，她的死是王先生造成的，有损阴德。传

说的情况是：夫人年轻漂亮，好打扮，岂不知这触犯了王秀才遵守的圣训“冶容诲淫”的忌讳，给她难堪，在封建道德的压抑下，她含冤自缢了。这事可信，而与雌卷应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王秀才办私塾，应该说与冬烘先生的念、背、打的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他是以讲授五经四书和练习作诗、对对、作文章为主，也可算是高一级的私塾了。有关他的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只记得传说的小故事：他弟弟叫王昶，跟他念书，开始学作八股文，八股文有固定程式，开头两句叫破题，要求是点明作文题目的含义，最好不露原题的字或词。一次王旭出题“论孝”。王昶的破题写道：“我母我侍，我侍我母，我不侍我母谁侍我母。”当时是他们的父亲已不在世，论孝么就只能说侍俸母亲了。这里他把“侍”字误写成“是”字，王旭一看，气过脑门，提笔批道：“你放你屁，你屁你放，你不放你屁谁放你屁。”

办学校，特别是私人创办，这比办私塾就复杂多了。首先是教室，如有寄宿生，就要有宿舍，还得管伙食，还要有必要的设备。王旭先生自费新盖了十五间房，还有一片操场。校舍分布情况是：后院东西各两间，前院算四合院，南北各三间，都是两面开窗，做教室用，东西也是各两间，北房西头加一间耳房。各房都有一条火炕，可以睡觉，做宿舍用，前院东房做厨房，雇用一名大师傅做饭。至于其它设备，虽说简陋，也还适用。如课桌，各炕都有一、二张炕桌；晚间自习，都用煤油罩子灯；另有一架风琴，一个地球仪，还有中国和世界的大地图，一架油印机（不是现在的钢板蜡纸的，而是最早那种用坏水写的）等。这里就提出一个经费问题，对当时具体收支情况，不得而知，从其个人生活和家庭状况，或可窥见一斑。

王旭先生办教育，可以说毫无营利动机，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他不会忘记。“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过去解释“束修”两字，是说一捆牛肉干，盖言其微薄也。然而他的经济来源，又只能靠学生交纳学费，以维持他的学校开支和他的全家生活费用。现在我已忘记每年交学费的数字，似无昂贵的印象。就王旭先生的生活状况来看，也是很俭朴的：夏天一件灰大褂，冬天一件老羊皮长袍，年年如此，未见他穿过新衣服。再从他家庭情况看，一无土地出租，也不用长工，更没听说过他放高利贷。家里有薄田数亩，完全靠雇用短工耕耘；这事全靠他续娶夫人经营。他有三个儿子，都是读书人，没有人种田：大儿子王树人（培之）写得一笔好字，学生多时，帮父亲做些教学辅助工作。二子王树德（滋之）自学英文成材，考取北平邮政局的邮务员，抗战期间又学会日语，任过伪职，解放后受到审查。三子王树善（继之）河北大学毕业，抗战时期任过我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科长，解放后曾在华北农科院任过秘书。王旭夫人是原宛平七区沿河城人，为人直心快，有点秀才夫人的傲气，敢做敢当。她给斋堂人留个话把儿，就是她在雇用短工时，沿街高喊：谁给我去打短儿，炒菜喝酒，大浆的蹄子粥，做一半，歇一半。（活计是往田里送粪，去背粪土，回来空着。）从以上情况看，按今天的阶级分析，王旭先生本人成份该定为自由职业者；其家庭恐怕连中农也划不上。尽管如此，而在山区有现金收入的人，其生活水平并不低，特别是王旭先生的二子王树德考取邮务员后，那时邮政待遇是有名的优厚工种，外国人办的，据说每月供给父母廿元，恐怕这也是王旭先生停止办学的因素吧！

重要的应该谈谈王旭先生的教学情况：这就从进校门说起。他的校门，每年春节，新桃换旧符时，从不贴神荼、郁垒二位门神，而是自书自写的门心大红对联，上联写“新以济

旧”；下联写“旧以济新”，横披是“新旧贯通”。这里的“济”字就作贯通解。这就清楚地看出他的办学和教学思想了。王旭先生从办私塾讲四书五经到办学堂讲新的教科书，无疑是一个创举，是他崇尚“维新”的思想表现，难能可贵！秀才当然深知四书五经中的“新”字有重大意义，易云：“日新之谓盛德”，《大学》汤之铭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含义，他能够以其所学科举的旧义联系他所处的民国新时代的现实，把新字理解为办新学、教新书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凭借他深厚的旧文史的功底，能够解释新教科书的内容，包括某些一般性自然科学的道理，而当时教科书又都属文言，那就更非秀才莫解了。

王旭办学堂的开始年月我不清楚，从我的经历可以说明一般情况。我1919年阴历正月入初小，可能是我村办学校开始的第一班。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上学之前，我的三祖父还在家办个私塾。我的启蒙老师叫陈文奎，据说是王旭的师范班的第一批学生。从此可以推断，王旭先生办学堂，可能在此之前的几年了。这也可以说明，王旭先生的学堂，开始就是“师范传习所”，为全区开办小学培养师资；当然这个传习所，明显是招收原来学作秀才的加以改造或者算作补习，就是说不是高小毕业后升上来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初小，哪来的高小呢？也可以说明王先生的高小班一定是在传习所办起来之后又增设起来的。

王旭先生对师范班的教学我不清楚，但我上高小的第一年，师范班的末班还在，有时也合班上过课；另外从某些遗迹也可窥见一斑。王旭的特长是文史学科，这也成为他教学的重点所在。师范班如此，高小班也是如此。我们这班高小班，从入学就全部改用白话文的教科书，这无疑是王旭先生的进步表现，可他仍不免留恋古文；当时师范班还是文言教材，记得他们读的一本书“文法津梁”其中讲文法所举的例子都是唐宋古文，在上这一课时，我们高小班也去一起听课。我现在还能背诵几句的如《醉翁亭记》《归去来辞》《诸葛亮出师表》等。还有，给我们高小班的一本语文辅助教材叫“观摩册”是王先生自己抄写的油印本，其中都是过去学生的优秀作文，学生名字很多，也有一人却多达十数篇。这也可算王旭先生教学法的一个有益创举。另外，他给师范班的教科书，如教育学、心理学等，可说应有尽有。有趣的是他对师范班的体操和唱歌两门课的教学，看来这对秀才是个难题，而师范班毕业后做小学教员，这两门课又是区别于私塾的明显标志，手工、图画也是如此，都必须教会学员。怎么办？这里又表现了王先生在教学上的创新精神，即“能者为师”。原来宛平八区，只在东斋堂设警察所，当时的所长是县里派来的，叫武子文，是个读书人，他携带个侄子来，也送去跟王旭上学；据说此人曾当过兵，会体操，就由他教这门课。另外，斋堂川有个后桑峪村，这村居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堂里有北平西什库大教堂派来的神父；当时都觉得天主教徒带洋气，因为会唱歌弹琴，也有的青年去上王先生的师范班，就由他教大家唱歌，也教一些人蹬风琴。手工课比较好办，当时只是一种工艺，用彩色油光纸编织各种图案或文字；需要有工具：如米度尺、三角板、足刀等，用一种油光纸做底子，中间切成均匀的条，另以鲜明对比色纸也裁成与底子等宽的条，或上或下的编起来，老师做不来，但可说的清楚。图画课也一样，当时只是铅笔画，另有图画纸，再有一块橡皮，照图画本描绘就是了，也不要老师示范的。——这些都是初学的高年级学生学会以后带低年级的。记得当时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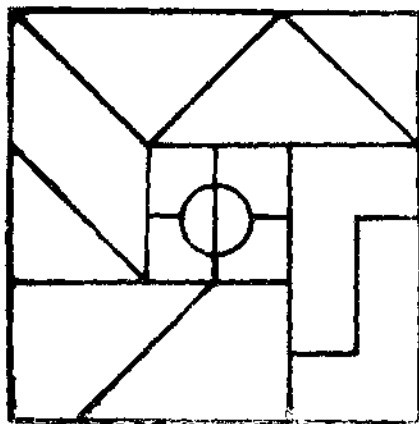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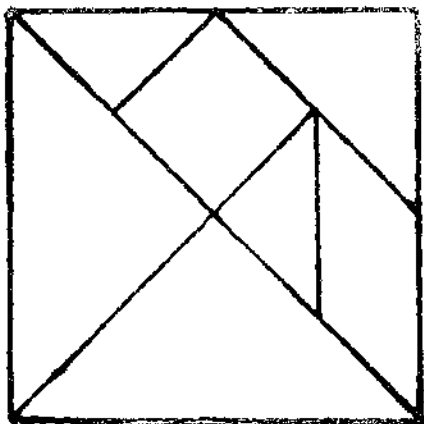
歌，总是那么几首，如《苏武牧羊》《淮阴留侯》《送别》，（还有几首唐诗，也都是王老师所喜欢的）。有时也学一、二个新的，那是从外面什么人那里学会带来我们学校教唱的。

对我们高小班的教学，首先是因为换了白话文的教科书，老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都与过去不同了（我们在小学四年学的都是国文），老师讲课，只把生字或生词解释一下，课文是白话一念就懂了。老师也觉得白话文好，教起来很省力，但也有肤浅之感，不免要多给些课外读物让我们学习。学生也觉得课文易懂，上课听讲不吃力，但难的是记忆。过去的课本都是文言，记忆靠背诵，尽管也不容易，但文词简洁，如果懂了，多念几遍也还能背下来，而白话文较为冗长，很难背诵。王老师改为在复习课时复述大意，这表面看来比背诵原文简单，实际上是提高了要求，如现在有的电影、电视剧是对原著的改编，是再创作的过程。我们原习惯于背原文，现在复述大意，既想按原文说，又背不过全文，更不会抓要点，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丢三落四，前言不达后语，差错百出，惹得老师同学哄堂大笑，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为了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王老师除添授上述“观摩册”外，特从商务印书馆买来两本黎锦熙著的白话文的“语文”和“语法”，做为辅助教材。“语文”有各种体裁的文章，论说文、记叙文、文艺（小说戏剧诗歌）和应用文（书信等）都有。印象最深的是两篇小说，一篇叫“一副金手鐲”，另一篇是“木主”，描写一个女子嫁给一家财主死儿子的木牌位，就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嫁给木头人一样的情节。语法里讲标点符号、九品词（名词、动词等）、句子分析（主语、谓语、宾语、补足语等）。更破例允许看课外读物，不过这是私立学校，没钱买书，只有一部章回小说《镜花缘》，王汝珍著讲唐敖、林之洋等游历海外之奇闻，也颇有趣。实际上我们背地看小说的风气很盛，各有所好，一般多是武侠之类，也有历史演义，最风行一时的是当时新出版的《江湖奇侠传》。据说比我年纪大点的同班或高班同学中有看过性史的，那是绝对秘密的，是老师绝对不允许的。

算术课不是王老师特长，不过照本宣科，也还是讲得清楚的。高小算术，只是四则运算，小数、分数、度量衡等，对秀才来说，这些无师也能自通；何况王老师似乎早就通珠算了。他给我们也曾加授珠算课，黑板上挂一个大毛算盘，珠算歌诀，也很熟悉的。

最有趣的是在上手工课时，王老师教我们两个带游戏性又能启迪智慧的工艺：一是七巧板，一是益智图。图形如下：



按图剪开，任意拼成各种图案或文字。王老师的得意之作是用益智图拼成了全部注音字母。这里补充说一句，王老师在语文教学中，把注音字母的拼音也列入了教学内容。我现在对注音比汉语拼音更熟练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王旭先生也举行星期日远足（现在的春游），回来写一篇游记，如有的记述大門口口的双塔，写道“如笔朝天”，甚为王老师称赞。这里补充王旭先生办教育的两件轶事：

王旭晚年好佛，这对他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影响。大概在我上高小的时候，顺义县有个在家修佛的居士叫沈贯然的（出家修佛就是和尚）来西斋堂讲经说法，教人参禅打座（现在的气功），首先灵水的刘举人相信了，随后王秀才也信了，因而在全区形成了修佛的风气。按我的分析，刘王两位的修佛，动机各异：举人喜欢的是沈的气功，能健身，使他老年得子；原来刘心斋的长子刘惠不幸夭亡，二子白痴，无生育能力，举人自然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训，在他七十多岁时又娶妾以期延嗣，求助于沈的静坐功而生效。王秀才喜欢的是儒佛贯通。佛教作为迷信，那当然是简单的，而佛学研究，就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准了。老沈宣传佛教，不只是低级的迷信说教，而是讲经说法的佛学研究，他推荐了不少佛经和有关论著，其中有一本“论语白话解”是山东历城江希张著，江九岁著此书，被誉为神童。他对《论语》有不少以佛经做解释，还有些新见解。我认为可能这就是引起王秀才好佛的动机，记得江解释“子不语怪力乱神”，说这是指怪力和乱神两个问题。而过去解释怪、力、乱、神是四种情况，秀才们对此也早有疑惑，就是《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地讲过“神”字：如“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在易经中提到“神”字更多了。“乱”字也一样，《论语》中有“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等。王秀才很信服江的这种解释，因而在他思想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概念：佛理与儒理是相通的，佛理当然就成为可信的了；同时觉得要学佛经，懂得佛理，没有四书五经的文字文学功底是不行的，这也触及秀才担心四书五经失传的隐忧了，他便利用暑假，义务为本村一些做小学教员的开了个四书讲习班。随后把文学也停了，专门又办了个五经讲习班。这首先得到刘举人的同意（也可能是受刘举人之托），把过继孙（刘惠的继子）刘凤基送来受教（凤基曾任海淀区物资局长，已离休），还有本村王树梅（字晨光，生前曾任内蒙地质局长）、东斋堂的谭林（现名鲁鸣曾任空八军政委，已离休）等。王树梅和我是高小同学，当时曾开他的玩笑：“你搞起刨坟掘墓的勾当了”。他说：“王老师的特长失传不也可惜吗？”现在看来，王旭讲授古典文献，似无可非议，但他和学佛联系起来就显得意义太暗淡了。

王姓在西斋堂是三个大户之一（另是杜、史两姓）。王旭曾利用王氏家族的公产收入，创办了一所“王氏义学”（私立小学），王姓子弟免费入学，这当然是件好事。族产的经营管理和对义学的领导都是族中推举的人担任，与他本人和他的高小没有直接关系（不算是附小），不过王旭的师范班的教学实习都是在这所小学进行的，对他也很是方便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对王旭先生这个历史人物是肯定的，而且对他办教育的业绩也是赞誉的。当然他一生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宣扬过封建礼教，特别是晚年好佛，又搞了些迷信活动，如他自己出钱重修本村地藏庵，塑立了十殿阎罗像，也按佛教节日做过道场，这又是应当批判的。

王旭先生死于灵岳寺的大寺里，时间可能在一九四〇年前后。他是在日寇扫荡平西抗日根据地，为坚壁清野由斋堂迁来的，有同志曾见到他，他当时已是耄耋之年，行动不便，而信佛弥笃。说到抗日问题，基于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对民族气节是忠贞的，他敬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在讲授历史教科书时，对近代日本多次侵华事件，义愤填膺。他目睹日本的烧杀抢掠，尤其是焚烧庙宇毁坏神像，更激起他的极大愤慨，因而对共产党抗日是同情的，曾问到过我们几个县里干部的情况，关心我们的安全。

王旭先生从一个前清秀才，经过民国到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战争的开始时期。对他的政治思想状况该做怎样的分析估计呢？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一个秀才成份的人，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孔孟之道，这是他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也是他的行为准绳。如他晚年好佛，是把佛的“普渡众生”与孔孟的“仁者爱人”视为一致，认为孙文推翻满清是符合汤武革命尧舜禅让的道理的，把国民党视为历史王统，这在教学中只讲正史、不喜欢学生看历史演义就是证明。他对共产党只接触到抗日的开始，如果多活几年，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会在《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不就是共产吗？）；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不就是各尽所能吗？）”。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得到解释的。至于有人说王旭办教育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的前期学生不少参加国民党，如谭体仁（名天元）、杨文波（名海春）等。我认为这都是当时形势和他们个人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不能全归罪于王旭的教学结果。前面讲过王旭办私立学校时的家庭经济情况，设想他当时不收学费，他的生活和办学开支怎么解决？学生入学特别是外村学生要带伙食入学，吃不饱睹子粥的人能上学吗？再从他创办“王氏义学”看，能说他只是给富人办学吗？至于说他前期学生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有力的反证就是他的后期学生（也包括部分前期学生），在“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时，绝大多数成为宛平抗日的骨干力量，很多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言而喻，这也不完全是王旭办教育的结果。总而言之，过去是国民党的公开统治，共产党在地下秘密活动，人们无法接受马列主义的宣传，一旦得到宣传，因为马列主义是科学，所以首先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以此为桥梁，再去向工农群众做宣传，革命就发动起来，宛平的抗日斗争的胜利是如此，全国也是一样。这也说明王旭先生办教育，传授文化知识，对革命是有贡献的。遗憾地是王旭尊孔孟之道，他坚信“群而不党”的圣训，尤其是受过去敌人诬蔑共产党的宣传的影响，恐怕对党是不赞成的。他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死去，又老而好佛，有些问题没来得及得到科学解释，就带着这些糊涂观念进了棺材了。惜哉！

斋堂古今浅谈

贾全玲 整理

(一)

在京西百花山下，清水河畔，座落着一个古老的村镇——斋堂。这个村子不但历史悠久，山水秀丽，而且经济、文化也很发达，加之地势险要，因而各个朝代都把斋堂视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传说早在战国时期以前，斋堂地区就有人在此定居，并且人数不少。后来燕王扫北时把斋堂的人几乎杀绝了。燕王做了皇帝，在蓟（今北京）建都，又从山西省洪洞县往斋堂移民。据说开始由一位姓贾的老者用担子挑着两个孩子到东斋堂定居。这两个孩子长大后各有五个儿子，分为东五门和西五门，从此贾家在东斋堂成了大户。后来又从山西省大槐树底下迁移来不少人，在西斋堂落户定居的就有20户，在东斋堂定居的也不少。因为他们是从大槐树底下迁来的，所以就在村里栽了许多槐树。当时西斋堂种了七棵，东斋堂不知栽了多少，时至今日，在东斋堂的村子中央还存活着一棵古槐。据碑文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由朝廷修筑了东斋堂城池，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池。方圆约一里左右，东西南北城墙各有城门一座。在东西城城门的石额上，有易州兵在万历四十五年间备道山西按察使解经帮给题写的“廓清”、“辑宁”四个字，两个城门上建有三间城隍殿，里面塑有神像。当时城内有东西走向的南、中、北三条街道，后来在清朝嘉靖六年被一场洪水冲去一条南大街和南城城门，冲走一百二十人，毁掉七眼水井，后来又被日寇烧掉了西城城门，还破坏了城墙。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东城城门仍然存在，“廓清”二字还明显地保留在东城城门的石额上。元代以后，斋堂村才分为东西斋堂两个村落。

(二)

在斋堂北边的白铁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规模宏大的灵岳古寺。该寺建于唐代，元代重修。它的地盘很大：南至茜鞍，西至铁崛山，北至荒草梁，东至浑河边。人们常说：“先有灵岳寺，后有斋堂城”，据传当时灵岳寺香火极盛，来往僧人很多，有些年老的僧人上山很困难，于是就在山下设了一个化斋吃饭的地方，名之为“斋堂”，大概“斋堂村”由此得名。离斋堂约八里处有个喂马养马的地方，名之为“马栏”，即今之马栏村。距斋堂五里处设有一个为来往僧人做饭的地方，名为“火村”。在斋堂附近还有很多寺庙。如天仙庙、龙王庙、老爷庙、城隍庙、圣人庙、朝阳庵、庄头寺、宝峰寺等等，不过现在幸存的只有天仙庙和西斋堂的宝峰寺了。天仙庙是明代修建的，大辽十四年曾经做第二次修葺。该庙共有三层大殿：前殿供奉的是天仙娘娘，两边设公案，两廊是七十五司（其它寺庙都是七十

二司，唯天仙庙多三司，即岳飞司、送子娘娘司和财神司）；中间的殿是过佛殿，内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两边是十八罗汉；后殿是十架佛殿。院子里还有灵官，是娘娘的战帅，此外，还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古松。

早年间，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这三天，十里八村的人们都来东斋堂的天仙庙赴庙会，各村的人们抬上娘娘轿，轿内坐着用木头做的、穿戴整齐的天仙娘娘，到天仙庙进香，求天仙娘娘降福人间。遇到大旱之年，还要起龙王会。各村的人都到龙王庙求雨。那时逢年过节，都非常热闹。过了正月初五，斋堂就开始热闹起来。有转花灯的。东斋堂的灯是八卦灯。人们都爱看东斋堂的花灯，有跑旱船的，船上有两个假人，一个是青蛇，穿着绿衣服，一个是白蛇，穿着白衣服，下边有人举着船跑。后来，东斋堂人又发明了“跑马”。马是由人扮演的，马背上骑着一个用草扎的大元帅。这些玩游戏的人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大街两边看热闹的人很多，真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整个斋堂村热闹异常。

正月唱戏也是斋堂城里的传统活动。那时斋堂有两座戏台，一座在东门外（现在还有），一座在西门外。唱戏的班子有从外地请来的，有时由本村的“六合班”表演。说起“六合班”，在当时还满有些名气呢！这个“六合班”是由六个村子联合办起来的，班主是西斋堂的史长山的爷爷，由他领戏班。后来由史长山当班主，可他并不会唱戏。据传“六合班”唱的戏很受当地群众和地方官吏的喜爱，在北平，在门头沟、在口外一带唱得特别红。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合班渐渐削弱了。到了民国十年，东斋堂又组织起一个戏班，名为“同合班”，由谭斌、贾宏庭、刘井文、贾宏楼等四十多人组成，请曾在六合班里唱过戏的贾士观当师傅。那时，请师傅、买戏装都是同合班的人自己出钱。这同合班曾在田庄、下苇甸、昌平、杨房、房山等地唱过戏。颇受人们的欢迎，也曾轰动一时。解放以后，八路军把斋堂的六合班改组为剧团，到各地去慰问演出，颇赢得各地观众的好评，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在民国时期，斋堂的商业特别繁荣，那时斋堂街上有八个大商号，其中有万源裕，经营粮、米、油、盐等杂货，有万巨兴和义兴隆、文成兴、大成兴、聚合祥、永茂堂及广巨隆香房。广巨隆香房是本村贾秀家开的，专门卖香。另外还有广升杂货铺及鸿顺兴等一些小一点的铺子，这些铺子的买卖都很兴隆，财源茂盛，各地客商频繁来往，使得斋堂镇的商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三）

在民国以前，清政府在东斋堂设行政衙门。文衙门管理民事纠纷，处理各村发生的事件；武衙门属军事性质，有枪有炮，并筑有炮台，维护着斋堂地区的治安事宜。到了民国时期，武衙门就归属军队了。

民国十三年，在斋堂地区曾发生过一起砸瘟疫局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口外发生了鼠疫，为了斋堂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国家在斋堂设一个卫生防疫机构——瘟疫局，给当地人民打防疫针，防止鼠疫传染蔓延。那里的人们从来没打过防疫针，不了解防疫工作的意义，很怕打针，所以都不愿去打防疫针，瘟疫局就采取了断然措施，即拦劫来往行人强迫打针，凡是通过斋堂的人都不例外。当时在杨家坪（即口外）有六国通商的外国人要去北平

送货，路过斋堂时被瘟疫局拦住打防疫针，他们不肯打，这样，就闹起了纠纷。于是杨家坪的人们就说了些吓人的话，造谣惑众。正好当时的斋堂人对防疫工作也不理解，于是他们就串通了胡林人砸了瘟疫局，并把瘟疫局的官员打得遍体鳞伤，险些致死。事后瘟疫局诬告斋堂人砸了瘟疫局，要求调兵血洗斋堂。这件事被当时的县长汤明肅知道了，立即来斋堂进行调查，结果了解到砸瘟疫局并非斋堂人所为。事实澄清了，斋堂避免了一场灾难。汤县长为斋堂人立了一大功。后来斋堂人民为纪念汤县长的功劳，给他和瘟疫局的官员树了碑，让后代人永记汤县长这位功臣。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两块碑都被毁掉，现在已荡然无存了。

(四)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东斋堂村西头有口大官井，当时那里是人们闲来无事蹲街的场所，平时总是不断人。各种消息，纷纷的议论，都从这里传播开去。北平陷落的消息也从这里传遍了斋堂。一天，有人说：中央军来了！接着确是卫立煌带领三个师自西经斋堂东进，直奔门头沟，意欲收复北平。但他们到达宛平王平村一带，就和日军遭遇，两军为夺取制高点——髫髻山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双方伤亡都不小，但各无进退。当时卫立煌住在斋堂以东八里的东胡林村。他委派原斋堂区（宛平八区）区长谭体仁（国民党员）为宛平县长，并责令他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支持正规军作战（卫立煌三个师的番号是第十师，八十三师和八十五师），另外他还指挥汤恩伯的九十四师攻打南口。卫立煌的十师部驻斋堂东北八里的灵水村，当地群众积极组织起来，防空、防特、防汉奸，支持军队作战，慰劳将士，都想为抗日战争做些事情，出点力量。大约过了二十天，由于日军在平汉线推进得很快，卫立煌军的弹药、给养接济困难，于是撤离了斋堂地区。老百姓本来就怕兵，怕打仗，尤其怕败兵和逃兵。卫立煌的军队一来，开始纪律还不错，在县政府的命令和宣传队的宣传动员下，还懂得打日本鬼子的意义，对当地群众没什么大的干扰，可是一撤退，就一变常态，抓伏、抓鸡、牵牲口、换鞋子、拿东西，……对地方骚扰很大，特别是汤恩伯为断后部队的九十四师从南口撤下来，一路糟踏抢掠，沿途村镇深受其害，斋堂地区也未能幸免。老百姓更耽心日本鬼子跟下来，那后果将更是不堪设想。

(五)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斋堂突然来了一支抗战队伍，人们称他们“红蓝箍”（以红蓝两色的臂章做标志）。据说这支队伍是“七七”事变后北平在押的政治犯，越狱出来组织起来的。其中有共产党员，为首的名叫赵同。焦若愚同志就是当时随“红蓝箍”来的，住在东斋堂进行工作。他了解了当地情况之后，认为能争取谭体仁抗日就太好了。所以在“红蓝箍”撤走时他却留下来准备做谭体仁的工作，但谭体仁实是个铁杆汉奸，他指挥他的保卫团和共产党对着干，妄图把共产党赶走或镇压下去。据说他确实抓过几个外来的共产党员给枪毙了。当时，风声很紧。焦若愚同志就到青白口村去我党组织，而斋堂的共产党员都潜伏起来进行秘密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邓华率八路军六支队来到斋堂，斋堂的地下党立即公开投入抗战工作，焦若愚接任了县长的职务，创建了一块抗日根据地，依靠政权扩大武装，改编地方保卫

困，动员出民间的枪支，动员参军，筹集粮布供部队吃穿。这时，谭体仁出于他的反动立场，暗地里同共产党较量。为此，我党组织当机立断，把谭体仁这个铁杆汉奸抓了起来。到五月份，邓华率命率六支队挺进冀东，由五支队来斋堂地区接防，这五支队就是由“红蓝旗”改编的，司令员是赵同，但不久就发生了赵同叛逃的事件。

（六）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向斋堂进犯。他们到东斋堂后，由军响村的汉奸谭怀耕指点烧了三处房子。西胡林村谭禹家在东斋堂开的商号“万源裕”被烧掉，原吕宛抗日政府曾驻在这里。日本侵略军一般是春秋两次扫荡，其主要目标是军区所在地——梁水一带。这样，斋堂往往是日寇行军途中烧、杀、破坏的对象。到了一九四〇年十月，敌人又开始扫荡，可是情况不同了，这次敌人进驻了斋堂，并在斋堂川修建了岗楼，相距不远就建一个。同时，还烧掉了东斋堂半个村子，围起了铁丝网，建立了据点，住有日军二百多人。开始，日军头目是范田，后来连续换有濑野、高桥、镇村，其中濑野、镇村这两个野兽极其凶狠。日寇进村后，斋堂的老百姓都藏进深山野岭，在山洞里或搭简单的草窝棚里住。等到了冬天，那些山洞、草窝铺无法御寒，带出的粮食也吃完了，人们无奈就逐渐回到了村子。老百姓一问村，敌人就抓人建立伪组织，派了乡长，发了“良民证”，在东斋堂还建立了一个“指导班”，特务头子是贾全书，“王家山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

王家山村是斋堂东北部的一个仅仅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由汉奸贾全书、贾全璧、宋福增带领着斋堂据点的三十多名鬼子兵和六十多名伪军在日寇头目濑野的指挥下来到了王家山，包围了村子，岗哨发现敌人鸣枪报警，一些青壮年都逃出了村子，而老弱妇幼却来不及撤走，被敌人圈回村子，全被赶进村里王文凤家的两间小屋，把门锁上，放起火来。就这样，把四十多人活活烧死在房内。“王家山惨案”震动了整个平西地区；王家山人民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大大激发了根据地的军民抗日热情。惨案发生后，斋堂地区的人民用血和泪谱写了《王家山小调》，并且很快地传遍了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五年，我八路军在解放平西的一次战斗中，把在平西宛平一带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濑野击毙。

一九四五年春，平西的形势和全国各战场的形势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大反攻的时刻已经临近，斋堂据点的敌人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慌了手脚，不断地调兵遣将，把西斋堂的伪军也撤到东斋堂，把岗楼烧掉，企图逃跑。我八路军埋伏在东斋堂村北的山上和村东的王家河滩，准备彻底消灭敌人。四月二日，敌人点燃天仙庙上的岗楼后，倾巢而出，一七公路就以三路纵队向东逃窜，刚出村口，空中就升起一颗信号弹，紧接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打破整个斋堂川的寂静。这时，埋伏在山上的八路军战士旋风般地冲下山来，和埋伏在王家河滩的战士汇合在一起，这时敌人也窜到了王家河滩，于是一场白刃战开始了。紧跟着东斋堂和附近各村的民兵纷纷赶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抬担架、救护伤员。还有不少老百姓手持铁、镐、棍棒在战场四周呐喊助威。在我抗日军民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彻底崩溃了，大部分鬼子、伪军被歼灭，剩下的小股敌人拼命冲出一条血路，向东仓惶逃窜。先期撤退的斋堂伪军——“新民指导班”四十四人，在我抗日军民的教育、争取下，于四月九日在清水涧车站

将伪军头目贾全书杀死，携带步枪四十支集体投诚八路军，斋堂川彻底解放。

(七)

斋堂川的解放揭开了平西八区抗日根据地新的历史篇章：进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清算复仇，斗地主、分田地，土地从此还了家。斋堂的穷苦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村里的青壮年都纷纷起来支援前线，争先恐后地往前线送公粮、运弹药、抬担架，剩下的妇女老人由妇救会组织做军鞋、军装，精心护理伤员，站岗放哨，防止坏人的破坏活动，防奸、防特，积极支援前线。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斋堂也随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首先是组织了互助组，即由几家自由组合成一个组，选一个组长，由组长统一安排互相帮着种地。到了一九五四年，又组成了初级社，把土地、牲口、农具全部交初级社，归集体所有，集体劳动。由全体社员选举社长、组长。当时东斋堂的社长是王文荣、张成珍。每天由社长分派活计，到秋后大家一起分红。到一九五五年以后，又扩大成高级社、人民公社。公社设在东斋堂。公社所属范围很大，当时斋堂公社所属东至雁翅、沿河；西至齐家庄、燕家台、黄塔；北至柏峪。又以十个村为一个大队。东斋堂和西斋堂及东西北山四个村为一个大队。社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由公社负责管理。社员的粮食都交到大队，全体社员都到食堂去打饭吃。当时东斋堂有三个食堂：即红旗食堂、东风食堂和一个来往行人都可在此就餐的八一活动食堂。到六一年以后，就发展为人民公社了，这时，大队的规模缩小了，每个自然村称为一个大队。也不吃大锅饭了。在这个时期，斋堂修建了水库，筑起了栏河大坝，修建了长达二十多里的斋堂水渠，新建了斋堂商店。大队还购置了大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和牲口，新添置了许多农业设备。斋堂地区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日子越过越红火。

(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斋堂地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政策活了，人民乐了，斋堂川沸腾起来了，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到处欢声笑语，到处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大街小巷的叫卖声接连不断，农贸市场的摊贩连成一片，整个大街商店林立。从西向东有斋堂乡亚利贸易公司、迎春堂饭店、新华饭馆、志泉修车部、兴隆饭馆、斋鑫修表店、应运综合小卖部、新颖服装店、斋堂零售部、木材家具店、斋堂副食部、小百货部、宝林饭馆、斋堂商店、颖时百货店、民众服装店、芸城商店和门城商店等十八个商号，还有个没有字号的买卖铺子，整个街面几乎全是门市部，如果赶上节假日，斋堂大街上就更加热闹，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拥挤程度不亚于北京城里的大栅栏，真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再加上来往的各种车辆不断地从街道通过，斋堂这条古老的街道就显得太窄了。但是，事物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斋堂川的人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斋堂这个古老的村镇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秀丽，更加繁荣昌盛。

门头沟后桑峪村天主教简史

高 振 亚

我叫高振亚，1923年生於本区军响后桑峪村，出生后第八天就被父母抱入本村教堂内受洗礼入了天主教。从小在教堂办的学校念书。

据传在元朝时期就有以行医为名的传教士来后桑峪村传教，那时是在一家民房内念经朝拜。

在元末元统二年建的小教堂，也就是公元1334年，那时全村有五十余户，都是教友，有100多教友，现在有大门口的石狮狗可证明，石狗上有文字“镇宅吉利，怀林德义”。

明朝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兴建五间大教堂，是在原处将小教堂拆除重新盖起五间长为16.6米宽为10米的大教堂，可容二百多教友，那时全村有六十余户，共有二百多教友，大门上原有一块匾，上书“三有真原”四个大字，下款是嘉靖十三年修建。匾已被日寇烧掉。

光绪廿一年，即公元1896年，因教友日益增多，当时本村有七十多户三百多教友，所以又在原五间的东部开山平地接出四大间，共为九大间，长30米，宽10米，可容四、五百人。周围的村庄如：大桥山、较塔、下清水、西斋堂、马栏、黄岭西、军响台上，也有教友二百多人，每到古礼日都来这里过宗教生活。在大门内屏风门上有匾一块，上书“博爱为怀”四个大字，下款是“光绪廿一年重扩修”。

元代的传教士都是以行医为名，随采随去，元末时全村五十多户都是教友。清朝时全村八十余户三百多人全是教友，附近村庄也有二百多教友，光绪年间有两位神甫常驻堂内，一位姓白是法国人，一位姓夏是比利时人，目前从青白口到大桥山（现在的张家铺）这一长达四十公里的清水河内的洋菜，就是白神甫从法国带来的菜籽种上的，所以到现在，只要河内有水，就能长出鲜嫩绿油油的洋菜，这种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是国外来宾最喜爱的美味佳肴。义和团运动时期，原宛平县老八区五十八村共一万多义和团在光绪廿六年即1901年的八月九日将八十余户三百多人的小小的后桑峪村包围的风雨不透，攻打七、八次也没攻进，因为教友们在重要道口用盛水的砂锅堵路，上面糊上花红绿的各色纸，扎在树与树之间，义和团认为是炸弹所以不敢轻入。

全村教友一致认为，义和团撤退于圣母升天古礼。所以第二年即公元1902年在田神甫领导下开始修圣母山即露德山，田神甫走后，是王神甫、安神甫，到高永禄神甫时才把圣母山修好，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此山被毁环。

1924年高神甫调走，赵义堂神甫来，与教友同甘共苦，不管是教内人还是教外人，都想尽一切办法救贫扶困。在1928年因连年灾荒，生活贫困，连个住处都没有，赵神甫知道后，马上把教堂村边的一段地划给二十户盖房，还从经济物质上给以帮助，使这二十户度过了下

来。在光绪廿六年后和圣母山一起修建的，还有一所若瑟院，有院长和修女常住，教小孩念书识字，同时期盖起了男学校一所，在路德山角下，北房五间南房五间，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多，本村和附近村的男孩子们都到男学校来免费学习，女孩子在若瑟院学习，教师都是神甫请来的。当时的孤儿现在还有在门头沟教书的，在北京工作的。

1935年冬土匪头子刘桂堂带领数千土匪来到宛平老八区骚扰，附近村的村民都跑到天主教堂内避难，赵神甫用小米做饭为大家充饥，等到朱哲元的廿九军把土匪打走，人们才各自回乡。宛平五十八村的村民为了感谢赵神甫的恩德，在第二年，即1936年，各村派代表来给赵神甫挂银匾、银锁，赵神甫为各村代表杀了两口大猪，举行了欢迎礼。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卫立煌带领中央军在石人山、壁岩山抗击日寇的进攻，卫立煌曾到过教堂。1938年宛平老八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赵神甫被我和人民群众选任宛平县抗日政府的县议员，还任救济总会的负责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地战斗在抗日工作中。宛平县第一任县长魏国元还有其他的县干部、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来教堂和赵神甫商讨过救国大事，杨成武、焦若愚、邓华、肖克等将军也都来过这里。

1938年10月，后桑峪村的教友为了抗日，到晋察冀边区办了第一个兵工厂。正当前线急需武器，肖克司令员来村动员凡会铸犁铧的人都参军到苇子水村新建的兵工厂去铸地雷、手榴弹，以打击日本鬼子的侵略。以杨茂林带头连同家属共34人，白桂云为师傅，携带炉上用具和行李走上了抗日的兵工厂。当时的厂长是贺明奇，政委是梁史文，工务主任白桂云，杨茂林担任副厂长兼股长。后来又有10多人去兵工厂，这些人一直到1950年从山西第三兵工厂退伍还乡。这些人中，现在仍在本村的有杨茂林、张中琴、杨甫恩、杨淑芳、杨廷朝、杨淑文、杨再德等人。在兵工厂的那几年，铸造地雷、手榴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时期，还有好多青年教友参了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的献身于祖国，在高堂中学的烈士碑上第一名就是教友杨广禄，他牺牲时是营长。第二名是杨巨恩连长，教堂内的先生杨广林，为了祖国及民族的尊严英勇不屈地死在日寇的刺刀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后桑峪的教友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1939年10月份日本鬼子进攻时，赵神甫的一些抗日文件及书籍叫杨广林先生坚壁起来，杨先生以为藏在圣母像的夹层和音乐楼上保险，结果被敌人发现了，把教堂全部给烧了，只剩下一个更衣室。文化大革命时期，圣母山被拆毁，粉碎“四人帮”后真是大块人心，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宗教政策后，后桑峪的教友们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欢欣鼓舞地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教友们都从内心里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的关怀和资助，教友们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团结，世界的永久和平，首长神长们的健康，飞教的弘扬，人民的幸福”而祈祷。

现在全村一百多户三百多教友，每年北京教区派神甫下会二、三次，能使村中教友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和各级政府，为了后桑峪教友能更好地过宗教生活，正在加紧筹划修建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

〔注〕高振亚：原籍军响后桑峪村人，曾任小学教师，现任后桑峪天主教爱国小组委员。

解放前碣石村的民办教育

李 国 平

振兴我区教育事业，除国家办学外，民办教育不容忽视，它应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于一九三四年在本村完小就读了三一年多小学，“七·七事变”日本进攻，学校被迫停课，人们回忆起这段历史，都赞叹的说“跟李春旭老师念了几年书可没白念，长了不少知识。”我的老师、革命烈士李春旭，1906年出生在我区黄土贵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师范毕业，知识渊博，写得一手好书法。“七·七事变”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曾任我宛平七区区委委员、区助理员。当时区公所设在青白口村，一九三八年日寇的飞机轰炸区公所时被炸死，炸的血肉横飞，尸体无存。经上级批准为革命烈士。李春旭老师在我村任教期间，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卓有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借历史于现在，回忆我村民办教育的历史，可能对发展今天的民办教育是有益的。同时怀念老师李春旭烈士的事迹。基于这种想法，把我村民办教育情况整理出来，教育后人。本文重点谈民办教育，但是不能不涉及到教育对促进村中文化、医药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雁翅镇北部山区，有一个山村碣石，从青白口村往北走十五华里，就到达该村，解放前俗称“到碣石路经九岭十八崖，老爷庙坡白搭。”说明了路途的艰难（现在已修了公路，汽车可直达该村）。碣石村那时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站在村东的老爷庙坡上，眺望村貌，似一条蝎子形状，坐落在山涧之中。距村北的书子岭三华里，距杨树地、塔上、避静寺小村五华里，距村东的黄土贵五华里。在北部诸山村中，碣石可算为一个中心点。

碣石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村中间街上有两株直径一米五粗的古槐，树龄约有四、五百年了，树冠茂盛，为村貌增添了光彩，传说树上住着仙家，解放后，破除迷信，把不少树枝砍掉，失去了当年风姿。早在明朝时就有这个村庄，明代戚继光就曾在该村驻军，以对付外族的侵犯，古往今来，碣石就是一个行政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碣石为宛平二区的东北小区，以此为中心，开展周围各村的工作。

该村的民办教育，始于清末民初，至“七·七事变，”已成为北部诸小村的教育中心，这段时间里，可称为民办教育的兴盛时期。全村九十多户人家中，挨门挨户的计算，七、八十岁的老人中（包括已故的）在本村读过书的有五十四人（不包括珠窝村李正宝、李正品二名走读生），其中有不少人学的不错，相当一部分人达到高小程度，有的当了小学教员。那时人们流行的一句话是“种地多种谷，养儿多攻书，”意思是土薄宜旱谷耐旱，可见人们对读书的重视，但是也有不少入，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另一些人家经济虽好，不愿供子女读书，有钱为儿孙后代置房买地，买牲畜，发财致富。

那时人们读的是私塾，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六言、五言杂字，以及论语、中庸、

大学、少数人学了易经等五经四书。当时书法、珠算也是重要课程。

当时的民办教育所以兴盛，是村中有一批热心教育事业的积极分子，那时村东修了一座龙玉庙，东房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三间。热心教育的韩永太等人，主张把为供龙王建的三间东房，改为教室，神像移至北房，这样三间南房，三间东房一直作教室和教师住房，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

民办教育的经费来源由村庙产供给，明清时期中有一寺庙，叫圣全寺，寺庙建筑可谓金壁辉煌。据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重修，可见庙已有悠久的历史了，经过年久失修和文革扫四旧的破坏，庙已无存，石碑砸断垒了石坎。那时庙上有两个和尚，有庙产100多亩地，香火颇为兴盛，烧香人不断。这庙产出租，典卖、借贷利息，所得收入供庙使用。清末大和尚、二和尚，迁居斋堂柏山寺庙中，这样剩下庙产归村公有，村中办教育的骨干以此作为教育经费，购置桌椅，聘请教师。先后在碣石教书的有本村的韩继臣、韩国权等，黄土贵的李正昶，苇子水的高××和后来的李春旭等人。那时聘请教师，一年的工资100元——120银元不等，后来改为纸币，纸币和银元的价值相差不多。学生上学的学费，一年级一年一元，二年级二元，三年级三元，四年级四元，五年级以上一年五元，学校其他一切开支均由村里负担。这样使民办教育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我于1934年在本村完小上学，当时学生共三十三人，其中有谱上村的刘国志、刘国荣，书子岭村的刘天恩、刘天爱、刘天才，黄土贵村的李士元、李士增，他们都是走读生。全校学生分为1—6年级，各级学生人数不等，分六个班，轮流在两个教室上课。全校只有一个李春旭老师，没有工友，连上下课打铃的均由老师一人承担。那时管理学校的校长韩智一人，只管学校经费使用，学校用具添置、维修等，其余校内事务均由老师一人管理。李春旭老师家住距学校五华里的黄土贵村，常住学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晚走，早归，非常辛苦。在校自己做饭，只吃两顿饭，有时太忙，年龄大点的学生帮助做做饭，吃些玉米粥或小米饭。老师和学生家长关系密切，没菜时家长送点咸菜、酸菜，我村有七十二口井，全村九十多户中有25户都有几分地的菜园子，种植各种青菜，从春到秋，给老师送点青菜，没菜时以酱焖黄鱼为菜，生活非常清苦。但老师一贯保持着饱满热情的精神状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学生无不尊敬。

三、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早晨到校必须检查是否洗手洗脸，有不洗者都严厉批评，甚至处罚。每天早晨七时学生必须到操场跑步，体育主要是跳高、跳远，以锻炼学生的体质，那时的课程内容，根据年级分设语文、作文、算术、常识、史地、大字、小字、唱歌、图画。大字主要学柳、颜字体。教学方法比较灵活，不搞死记硬背。上算术课有时是在操场进行百米跑算，就是在操场一端，每人持石板一块，要老师出题，加减乘除均有，有时十道题，有时题多些。有二位数、有三位数，哨声一响开始进行，一边跑一边算，到达终点，算完算对为优胜者。课余时间给学生讲故事，主要内容是富人怎么压迫穷人，反对迷信的故事。也有时用讲故事的形式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并让同学念、背诵孙中山遗嘱，以教育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在学生中提倡互敬互爱，同学们有了病，就发动同学去慰问，帮助其家作些零活，还组织学生给孤寡老人拾柴碾米面，有时发动学生打扫村中街道卫生，从小培养爱集体，爱劳动的品德教育。由于老师的治学严谨，当然那时也有体罚，总的看学生的思想、文

化有很大提高，成绩显著。记得1936年夏，七区区公所在青白口村外永定河边的沙滩上，举行了全区性的观摩会，碣石村去了二十多人，村里给学校买了一面国旗举着参加了观摩会，要求参加观摩的学生一律穿蓝市布褂子、裤子、黑鞋、白袜、衣冠整齐的来到青白口。沿河，田庄、青白口等村的学生也都来了，在观摩会上，比赛了作文、算术、大楷、小楷等课程，体育项目比赛了跳高、跳远，观摩会非常隆重，全区学生还合了影。我村的成绩还算不错，当时合影留念，可惜这张照片，在日本进攻时失落了。

李春旭老师在碣石任教期间，作出了很大成绩，培养了人才，我们这三十三个学生，大部分前后走向了革命，有不少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骨干。三十三人中加入共产党的有25人，占总数70%多，曾担任地、师级干部的有七人，县团级十一人，还有四人当了小学教员，这些人分布在江西、河北、新疆、内蒙、湖南、北京、山西、山东等八个省市。有的同志，为革命牺牲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老师李春旭也牺牲在日寇的弹火之中。

由于我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不少人识字，人们思想有不少变化，推动着村中的文化娱乐事业，远在清朝末年，村中有了皮影戏，皮人装了满满一箱，购置了各种乐器，有四、五十件之多，直径一米粗的大鼓就有四只，还有一个大堂鼓。演皮影戏的文武场齐全，并组织了锅子会，每年阴历二月初二，村中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吹打着各种乐器，打着各种黄旗到老爷庙、龙王庙、圣全寺、小白龙庙降香求福，到晚上演皮影戏，有操作各种皮人的，有唱的，有操文武场乐器的，那时上演的剧是河北梆子，戏名有大登殿、二进宫、凤还巢、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几十个传统戏剧。周围村的男男女女也有来看戏的，情景好不热闹。抗日战争中，皮影、乐器被毁。从此皮影戏、锅子会也就散摊了。人们有了文化，打开了视野。清末民初，村中开了三个店铺，临街的门脸有大平门、小平门，还有张永隆开的油盐米面杂货铺。大平门、小平门早已关闭，只剩下张姓一个杂货店，所有这些杂货店，都是由自己经营，不请外人，自己购货算帐，大部副食品种，多从矾山堡进货，也有从北京进的。当时卖些酒、酱、醋、油、糖果、花生、豆面、白面、莜面、荞面等，后来又有三家在杏秋、核桃秋时收购杏仁、核桃，运往北京、天津出卖，再买回些布匹、袜子、腰腿带、针线等几十种日用品。中秋节经营月饼，春节经营香纸亡书（迷信品）等供品，所以不出村就可买到生活日用品，方便了群众。

民办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碣石的医药也得到了发展。在院上开了两家药店，一家在民初败落，一家药店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关闭，那时两家经营中成药有400多种，一般的药不用到外村去买，就地可以买到。

清末民初李广文、李广泽两家子孙11人学习了中医，当时对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可算是雪中送炭，有的人具有很高的医术水平，在周围各村颇有名望。李广泽父子经常在青白口傅家台一带行医，李广文父子经常在石羊沟、狮子沟、龙门沟诸村行医，有的远至怀来、涿鹿县的部分村中行医。解放后中医李国贤、李国政等在沿河城和他人开办了联合诊所，李全品、李全弼等在青白口村和他人开办了诊所，这对缓和农村缺医的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那时村中过年写对联，墙上写大字、诗句，算帐均不用到外村找人。所有这些，没有一批有文化的人是搞不起来的。

悠久的民间文化遗产 珍贵的历史民间艺术

——记门头沟区千军台、庄户村古幡会

包世轩

京西门头沟区千军台、庄户村的古幡会，能够得以恢复并发展到今天的盛况，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没有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的思想解放、生活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感慨之际，出于历史责任感，写作此文，将北京市仅存的古幡盛会公诸于众，让人尽知京西丛山峻岭的深山村至今还开着一枝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并借以预祝它越开越茂盛越鲜艳。亦借以对弘扬民族文化，不管是已故的，健在的或风烛残年的山乡老人表以钦佩之情。

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夕，刘贵明、刘炳孝、韩云鹏等几位老人到区文化工作办公室，要求恢复民间幡会活动，得到办公室的同意和支持，经区政府领导同意，于当年元宵节，古幡会在千军台、庄户村恢复了活动。尽管天不作美，下起鹅毛大雪，但五颜六色的幡旗在银装素裹的丛山峻岭衬托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人潮中旗幡队列中的音乐班吹奏乐与锣鼓声相互交融，犹如报春的雷声。古幡盛会的新生很快传开，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中央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为了搜集民间艺术，定于正月十六日到千军台、庄户村拍摄古幡会盛况，但到十六日除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外，还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首都文化界、史学界、新闻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翁独健先生、陈述等，著名学者戴逸先生以及新华社、北京社科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都到来欣赏、考查。空前的盛会，空前的壮举，深山村沸腾了。后北京社科所《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编剧之一的周雷同志，率先在《中国地方志通讯》封面封里刊登了几十幅幡会照片，《北京日报》又刊登了幡会、“小车会”摄影照片。使京西这支民间艺术之花，在百花园中尤显得光彩夺目。

一、幡会历史溯源

千军台、庄户是两个山村，地处京西古道沿途，据《宛署杂记》所载，明万历年间千军台称“千人台”，庄户村叫“庄窝”。这条古道东达京城，西经大寒岭达斋堂川可通往怀来、涿鹿、蔚县，并可以从怀来盆地抵达蒙古草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寒岭又称“大汉岭”。传说是匈奴与汉交界，是有历史根据的，在汉代，今怀来县、蔚县一带的确为匈奴族首领“单于之庭”所在地。1985年以来，在斋堂后山曾出土汉代铜尖铁杆箭簇120余支，在千军台、庄户以东十余里的石古岩上出土汉代铁剑一柄，铁杆箭簇数支。都证明汉代在此驻军扼